[清史研究评介]

尊重历史　新意迭出

——《明清易代史独见》读后

袁　森　坡

1991年新春伊始，我怀着先睹为快的喜悦心情，展卷阅读了陈生玺同志之力作《明清易代史独见》一书，反复体味，收获颇大；因为这部著作材料丰富翔实，观点新颖，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考订精确翔实，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一些关键问题上，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对过去史学界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问题，作者溯流探源，进行了审慎求是的分析，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做到了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

在考订方面，作者对歧异较大、互相抵牾的史料进行了极其认真的搜集、整理，审慎求是地鉴别和考订，尽量把问题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抓住问题的核心与关键点，微观上力争深入，宏观上尽量全面，先展现史实的本来面貌，再进一步阐明它的意义。陈生玺同志在《序言》中说：

> 对同一事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绝不能因此而改变事实本身，所以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好恶和时代的需要来塑造历史、进行取舍，既不能为尊者讳，有意护短，亦不能恶归下流，把脏水往一个人身上泼，而应当把当时在政治舞台上进行较量的各种力量，放在同一天平上进行衡量，评比他们的优劣是非。

作者进行研究的上述指导思想，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搞臆测，力戒武断，反对感情用事，摒弃主观唯心主义，所以得出的结论令人折服，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今试举几例，予以说明：

作者在《关于毛文龙之死》一文中，根据《满文老档》和朝鲜《李朝实录》等有关史料，对明清之际的一桩历史公案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明亡以后，崇祯帝惨杀袁崇焕的千古奇冤，已大白于天下，但袁崇焕杀死毛文龙的事件却仍然是非不明、真相不清。传统的意见认为：毛文龙据守皮岛（亦称椵岛，在朝鲜西海），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后金阴谋通款袁崇焕，求杀毛文龙；袁崇焕不知不觉地中了反间计，翦后金所忌，自毁股肱，杀死了抗金英雄，加速了辽事的失败和明王朝的灭亡；毛文龙被杀是历史的大冤案，应该予以平反；袁崇焕杀毛文龙，是袁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对袁的功过应重新评价。这种观点直至本世纪80年代，在若干学术论著中，仍为一些学者所赞同。陈生玺同志认为：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52年），毛文龙已瞒着明廷与后金通款；次年，从闰六月起，毛就正式派人私自去与后金议和，杀死了袁崇焕从山海关派来的官员杜佑，因杜佑主张将毛文龙移镇至内地或旅顺、海州、盖州；毛文成还声言要取朝鲜、下山东，到一处收一处。由于毛文龙投靠大宦官魏忠贤，许多不法行为才得不到应有的追究。毛文龙之所以没有轻率地投降后金，因为此举将使他完全丧失明朝、朝鲜的接济，其属下的数十万军民又都痛恨后金的残暴，使他不得不有所顾虑。在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即从明天启七年九月以后直至崇祯元

年十二月，毛文龙与后金的往来十分频繁，意图是假借皮岛的地位，让后金封他一个刘豫式的傀儡国王。由于毛文龙的部下王子登向袁崇焕告密，袁才采取果断措施，处死毛文龙。作者在充分论证后断言："毛文龙因阴谋投降后金而被袁崇焕所杀，这一事实是得到了充分证实的，袁、毛的是非功罪当剖白于天下，以正视听。"这篇论文有理有据，极有利于问题的探讨和深入，在学术界已有良好的反响。

关于洪承畴的降清问题，作者也有灼见。《清史摘·洪承畴传》曾引昭梿《啸亭杂录·用洪文襄》条，说洪承畴被俘以后，科跣谩骂，拒不投降。皇太极曾亲自临视劝降，对之解衣推食，使洪深爱感动，乃叩头请降，皇太极"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清军八旗贵族对此不解，皇太极说是觅得了一名逐鹿中原的向导："吾安得不乐也？"陈生玺同志考订后认为：洪承畴被俘之初，确有"延颈承刃，始终不屈"的忠烈态度，但不久他就改变了初衷，数天后（崇德七年四月一日左右），他已"欣欣自得，侥幸再生"，愿意归降。当时，宠冠清宫的宸妃去世，皇太极痛不欲生，健康恶化，不可能亲自去劝降。洪承畴身为明军主帅，却贪生怕死，"皇太极认为并不可取，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祖大寿均未受到重用；至于说用之作为入据中原的向导，皇太极对此则另有主张，而且他已派兵三次深入内地，这方面并不乏人。张存仁、祖可法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都是日夜盼望清军早日入据中原，他们好率先作为向导"。证之史实，在崇德七年五月至崇德八年、顺治元年四月的两年间，洪承畴确实没有得到为新主人"亮相"效力的机会，作者的见解，颇有益于学术界对这一历史人物的深入研讨。

作者在《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之真相》一文中，对明清易代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以求历史真貌的辛勤探讨，新见迭出。1644 年清兵入关，关涉着明朝的灭亡、李自成的失败和清朝的胜利三个方面。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大明王朝灭亡；李自成的大顺王朝正待建立，即于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之战中败于清兵，四月三十日退出北京，前后共 42 天；清军四月九日从沈阳出发，经山海关之战而长驱直入，于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后仅 23 天。从此清以北京为立足点，先后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和南明的几个小朝廷，统一了全国。这一剧变，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吴三桂降清所致。作者却认为：一、1644 年清兵入关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清朝在关外长期向外发展的结果，是清军长期南进政策的继续。清军准备充分，力量雄厚，智囊众多，即使没有农民军进入北京和吴三桂开关降清，清军也是要逐鹿中原、谋取北京的。因为根据范文程的计划，已将中原尽收眼底。吴三桂之开关降清，只是给清军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方便条件，改变了清军的入关路线，加快了清兵的入关过程。清军之问鼎中原，是请亦来，不请亦来。二、李自成的失败是难免的，因为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上都逊清一筹。如定都，李自成保守退避，定都西安，李自成曾说："富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忙着把北京的财物运回西安，而清朝却积极进取，定都北京。在军纪上，农民军住入民房，军纪荡然，大失人心；而清军却一改以前烧杀掳掠的作风，比较注意军纪。对明朝降官，农民军追赃拷掠，无所不用其极；而清军曲意招徕，使降官如庆更生，感恩戴德。对待吴三桂，农民军掉以轻心，低估了吴三桂投清的可能性和吴军的战斗力；清朝却通过已降清的吴三桂的亲朋故旧，一直在对他招降引诱。在开国方略和战略方面，农民军主帅们政治视野狭隘，谋略平庸，远见和宏猷都逊于多尔衮、范文程、洪承畴等人。洪承畴根据李自成在北京的措施和动向，认为李军"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仍然是流寇主义，当清军直抵燕京时，果不出洪承畴所料，李军仓皇溃遁，将北京丢给了清军。

这篇文章，对吴三桂的心态和向背，分析得尤为精彩，合情合理，入骨三分。字里行间，闪烁

着求实精神的光辉，摒弃了脸谱式的勾勒。作者认为："吴三桂之降李与降清，都不是预定的，而是当时形势骤变促成的。……形势的变化，各方力量的消长，使得这些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朝秦暮楚，对吴三桂来说，降清与降李是一样的，并无高下之分，都是为了自保和唯利是图"。吴三桂曾投降李自成，由于李军拷掠明官，其父吴襄也被拷追赃，"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沂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贼得京师招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杀，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张怡《谀闻续笔》卷 1）吴三桂南逼于李军，东北迫于清军，腹背受敌，势不得全，才向清朝请兵，但吴三桂请兵是有条件的，即要求清朝"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南北通好。"因此"清帅许之，撮刀说誓，而以兵若干，助挂击贼"。（同前书）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也曾派明降官张若麒到吴三桂军中议和，吴的条件仍是"请归太子二王，速离京城，奉太子即位而后罢兵。"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吴三桂向清军求援是有条件。但清军进入山海关后，凭自己的军事优势，而背信负约，巧取了北京，吴三桂失其所据之山海关，在清军的利诱（封平西王）之下，才死心塌地，成了清朝的鹰犬。30 年后，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责清朝"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据燕都。"清朝却闪烁其词，不敢正面回答。陈生玺同志的上述分析别开生面，但有理有据，极为中肯。

在明清易代之际，一般人都知道陈圆圆（陈沅）与吴三桂的故事。有些史料记载，陈圆圆被农民军大将刘宗敏所掠，气得吴三桂拔剑斩案，率兵疾归山海关，向清朝乞兵，以后的官书如《明史》、《清史列传》也承袭了这一说法，因而是说广为流传，似乎已成铁案。陈生玺同志却认为："渲染陈沅一事，是出于下列原因：在故明遗老和一切反清者而言，是为了讽刺吴三桂降清，象吴梅村之《圆圆曲》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在清官方而言，因为吴三桂后来叛清，用此适足以贬责吴三桂之人格，实则此事对当时形势并非决定性的影响。"当然，作者并不否认此事对吴三桂的情绪是有影响的，只是并非"决定性"的而已。决定性的影响，是李军对吴襄的拷打追赃，使吴三桂的利益和尊严受到了损害，从而认定自己投降李自成不会有什么前途。

在《陈圆圆其人其事考》一文中，作者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吴三桂为什么要降清，封建史家的传统观点说是因为刘宗敏抢了他的爱妾陈圆圆，……这种观点把明末三种政治力量——关外的清兵、李自成农民军和明王朝之间长期斗争的结局，归结为一个妓女的被劫，当然是错误的，需要予以澄清。"但近年来也有另一种倾向，如姚雪垠先生在《论圆圆曲》（载《文学遗产》1980 年第 1 期）一文中，把陈圆圆的问题提得很高。他说："陈圆圆的故事关系着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李自成进北京后迅速失败的原因，如何认识吴三桂降清的真正原因，以及对刘宗敏的如何评价等重大问题。"姚先生为此进行了论证，说在李自成进北京以前，陈圆圆已经死于宁远，所以关于刘宗敏拷掠吴襄、追索陈圆圆，以及吴三桂勾引清兵打败李自成后复得圆圆，圆圆后来到了云南等，全属虚构，是出于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诬蔑和对吴三桂降清的诛心鞭挞云云，从而对陈圆圆 1644 年后的存在，采取了否定态度。陈生玺同志针对上述两种倾向正本清源，进行了辨析，用翔实、生动、具体的材料，考订了陈圆圆的家世与出身，陈圆圆在苏州被掠的经过，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的情况，陈圆圆晚年在云南的结局等方方面面，读后对陈圆圆坎坷的一生，有了清晰的了解。他在该文的结论中指出：当时士大夫纳妾畜妓现象相当严重，成为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自然也会反映到农民军的队伍中来，这就是为什么陈圆圆作为一个妓女，田弘遇在苏州花了几千两银子，贿赂地方官，以势掠去，到北京后又辗转到了吴三桂手里，刘宗敏进北京后闻沅之名，又向吴襄索取，从这方面来看，闻沅之名，大向吴襄索取，从

这方面来看，陈圆圆之被劫，乃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一种社会现象。”陈生玺同志引刘健《庭闻录》的记载作为反证：“至渭三桂入卫之时，方欲取沅，与谓沅在宁远者皆非也，惟吴梅村《圆圆曲》得其实。当时梅村诗出，三桂大惭，厚贿求毁版，梅村不许，三桂虽横，卒无如何也。”刘健生于清初，其父刘昆曾在云南做官，因反对吴三桂叛乱而被囚禁，对吴三桂的底细是了如指掌的。这篇论文摆事实，讲道理，足以纠正某些同志随心所欲地曲解史实的倾向。

《李岩在北京史事新考》一文，也是一篇力作。近十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否认李岩的存在，根据是《开封府志·李公子辩》及郑廉《豫变纪略》中说杞县没有李岩其人，因而断定农民军进北京后一切有关李岩的记载，都是出于地主阶级的偏见或别有用心，是为了诬蔑李自成而臆造、虚构的人物。一时之间，李岩的存在与否，被蒙上了疑云。陈生玺同志根据吴伟业《绥寇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史·流贼传》、谈迁《国榷》、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赵士锦《甲申纪事》、孟森《霜猿集校订补注》、《明懿安皇后外传》、《流寇志》卷11、顾丹午所录王承曾《苦海还生记》、张怡《谀闻续笔》卷1等书中有关李岩（李信）记载，披沙淘金，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并搞清了学术界错误的原因。作者指出：李岩确有其人，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军后作出过贡献，受到重用，后遭排挤而被李自成嫉杀。农民军在北京期间，农民军的大将李友住西城邱字胡同许锦衣宅，李过，住在东城袁祐宅，刘宗敏住在西安门田弘遇宅，李岩住在崇文门周奎宅。“否认李岩其人者，将李友误认为李过，再将李过的住处移于李友处，而说住在周奎府的李岩乃李友之误，显然是错误的。”这是原因之一。再者，“李岩在京不受重用，后来一度离开北京到天津，所以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初关于李岩的记述较多而后期较少，这也是引起人们怀疑李岩有无其人的原因之一。”作者正本清源，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是对明清史和农战史研究的一项贡献。

在加强薄弱问题的研究方面，作者认真探讨了明末的蒙古问题、明清的议和问题、剃发问题。这里仅以蒙古和剃发问题为例说明之。

近年来，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变革者在诸如历史人物、战争、满汉关系、清朝开国的政策诸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研究明末的蒙古问题者虽也有一些论著问世，但比较起来，还相对薄弱。作者在《明末蒙古各部的纷争与清（后金）对漠南蒙古的征服》一文中，系统地分析了自明初至明末300年间蒙古各部之间，蒙古、明朝、女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回顾历史，有明一代，明蒙之间铁马金戈，战争不断，在《明朝经世文编》的奏疏目录中，有关“九边”边防的论述几乎占了1/3，明朝耗尽人民的膏血，大修长城，就是防御蒙古入塞寇掠的明证。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明蒙关系的主流是什么？战争的实质是什么？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诸如《亲征漠北》、《土木之变》、《景帝登基守御》、《议复河套》、《庚戌之变》、《插汉寇边》等节，都弥漫着战争的气氛。但作者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考察后指出：“蒙古各部由于经元一代和中原地区在统一政权下，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上已经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原而独立存在，所以终明一代，寇边的目的是为了迫明通商，掠夺财物或者要挟赏物。……漠南蒙古移驻于近边地区，是为了便于钞掠或挟赏，即使是远处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也要通过漠南蒙古作中间人与明通贡互市，所以明末东起辽东，西至哈密，凡重要关隘与交通要道，无处不互市。明王朝由于自己的衰弱，北部边境也完全处于蒙古和女真各部的包围之中。”——这段话正确地指出了明蒙之间经济上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联系，战争的实质，是要扫清经济交流的阻碍，也指出了明季北部长城沿线被包围的形势，所以皇太极在征服漠南蒙古以后，“大大加强了清王朝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消除了全力征明的后顾之忧，奠定了清室入据中原的基础。”在明清对

峙之际，蒙古投清则清胜，附明则明强，地位举足轻重。清（后金）统一了漠南蒙古，使得明朝九边垂危，防不胜防。作者从一个侧面，补充了史学研究领域的某些不足。

清朝入关后强令汉族人民剃发易服，曾激起汉族人民的猛烈反抗。在《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一文中，作者以严肃而冷峻的笔触，讲述了三个问题：（一）、满族的剃发习俗和清在关外的剃发制度；（二）、入关初期的一度罢剃；（三）、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剃发令的一场斗争。剃发与否，本来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问题，但满族统治集团在建立清王朝的过程中，即强迫汉人必须遵照满人的习惯，实行剃发，并改服满人衣冠。结果，剃发与否，无论是形式和内容，在当时都被看成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风俗习惯问题。清王朝之所以如此强硬地采取野蛮残暴的手段推行剃发令，强迫汉人在几天之内改变自己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服饰习惯，提出"以剃发为一统"的口号，陈生玺同志认为：满洲贵族的目的之一是接受金、元的教训，防止满族受汉人风化的熏染，以保持满洲政权的特点；目的之二是怕触发汉人的故国之思，在与南明残余势力的斗争中，要断绝其归明之路。

作者在《剃发令在江南地区的暴行与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当时汉人的故国之思，眷恋自己的衣冠之旧起了很大作用，这完全是由于清王超强令剃发这种错误的政策造成的。所以清初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直接间接与剃发和衣冠之制有关。"结果，苏州、常熟、太仓、昆山、嘉定等地都爆发了以反剃发为主旨的保卫民族尊严和文化传统的抗清斗争。清军大肆杀戮，常熟杀了 5000 余人，在太仓杀人万计，在昆山杀死三万口，收尸 2400 余口，在嘉定残杀二万余人，江阴城内外被杀十七万余人，金坛"积尸如山，流血漂石"，武进"杀伤数万"，嘉兴被杀 7—8/10，松江死亡 9/10，达二万余人，上海被杀五六千人。作者通过以上血淋淋的事实说明："当时江南人民对明王朝并无眷恋之情，无意去保大明江山，是清王朝背弃了入关初罢除剃发令的诺言，把人民推到起义抗清和维护明王朝的方面去了。"陈生玺同志进而指出：剃发"实际是毫无意义和极端愚昧的，它所得到的效果适得其反：一，延缓了清王朝统一全国的时间，清兵从入关到进入北京才二十余日，从进入北京后西征打败李自成转而南下取南京，前后时间仅一年，但在下南京以后到征服东南、西南统一全国，却历时近二十年，而且战争进行得极端残酷，对江南地区的经济破坏也很大；二，加深了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情绪，使有清一代的革命多打着反清复明或反满的旗号，把满族置于与汉族对立的地位，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这些见解，有高度的概括力，读之令人怵目惊心。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注意，在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根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提高兄弟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科学文化水平，而且应该尊重兄弟民族的信仰自由、风俗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感情，调动各民族同胞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

作者在行文时，注意到了客观、公正、全面，但又不是纯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评述，而是渗透着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比如，在有关剃发的论文中，写有些汉官为了博得清朝统治者的青睐，谄媚逢迎，率先剃发易服，如孙之獬剃发易服后，既不容于汉班（其时汉官仍为明朝服饰），又不容于满班。孙之獬于是羞愤上疏，激使清朝统治者于乙酉年（1645 年）第二次下剃发令，造成了"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的惨痛悲剧，作者指出，"他们的历史罪责，是无法推诿的。"将这些寡廉鲜耻的汉官 们的嘴脸暴露在读者面前，令人切齿扼腕，力透纸背。

《明清易代史独见》一书成就蜚然，难以一一罗列。应当指出，作者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与他所受的严格教育密切相关的。作者于 1952 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56 年毕业后考取了研

究生，导师即海内外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教授。郑老善于启发和诱导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在郑老的启迪教诲下，作者历经坎坷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遵循了郑老倡导的原则：第一，要详细地全面地占有材料，进行广泛联系。因为只能详细地全面地占有材料之后，才能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中，"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列宁全集》中文版 23 卷 279 页)其次，占有材料的面要广，联系要广；三要新，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四要严，不虚构，不抄袭，事事有来历，处处有交待；五要通，互相能解释通，从中找出规律来，材料能经得起检查，细节也确实无误。作者写《独见》一书，处处体现了郑老创导的精神，所以读者阅读时如行进在山阴道上，真是新意迭出，美不胜收。新在哪里呢？因为资料全，见解新，既有新论证，又有新的探索和推动。

《独见》一书探讨了易代之际相互关联的十个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不讳言，在层断面和广度上还有所不足。明清之际，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交织的时期，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各阶层人士都有过"山崩地坼"、"椎心泣血"的惨痛经历，最后才归于一统，成为清朝的"子民"，这一阶段可探讨的问题很多，诸如蒙古贵族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的作用；汉族地主阶级不同集团在易代之际的分化、斗争、组合，某些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农民军失败的原因，南明几个小朝廷的灭亡，清朝的政治、经济措施等等，都值得专文论述。就以汉族的降官降将的作用而言，至少可以归纳为下列方面：为新朝制订夺取中原、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和农民军的"开国方略"为清军制订作战方案；替清军扫荡驱除作先锋，为清朝经略江南和西南，招降纳叛，设计用间；出任清朝官吏，为新主子建立和强化封建秩序。每个方面，也都有丰富的内容，值得继续探讨和研究。所以《独见》一书在深度上分析透彻明了，在广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开拓。我们深信，以作者深厚的功底和虚怀若谷的谦逊求实精神，在《易代史》的研究方面继续取得新的成就，是可以预期的。